本版编辑：杨志梁
E-mail：m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经济学家

稳增长的重点

□ 王东京

2011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节点。为了调结构，这一年政府提出“稳增长”，意欲将GDP增长从高速调为中高速。有政府调控背景，此次经济下行本在意料之中，不过下行速度之快还是在许多人意料之外。2010年GDP增长10.45%，2011年降至9.2%；去年降至7.4%；今年上半年仅为7% 。于是有人担心，中国经济会从此走下坡、风光不再。

曾说过多次，我对中国经济前景一向乐观。想当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国际上不少权威机构断言2009年中国经济不能保八，而我撰文指出这看法是杞人忧天。果不其然，2009年GDP增长8.7%。实不相瞒，我说中国经济能够保八可不是望天打卦，那篇文章今天网上还能找到，后来收入我出版的《中国的前景》，白纸黑字，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看，我当时乐观的理由这里不重复。

英雄不提当年。时过境迁，当下读者关心的是对今天经济形势怎么看。上半年GDP已下行至7%，而7%是中央提出要保的底线，这个底线我们能否守得住？李克强总理最近说：目前经济指标趋稳向好，中国有能力应对风险。我的看法也如是。不过我认为守底线得有个前提，那就是要在关键处应对得当，否则行差踏错，经济可能滑出底线不是危言耸听。

众所周知，本轮经济下行的原因主要是以往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与出口拉动，而美国金融危机后欧美贸易保护盛行，中国出口受阻，国内产能出现过剩。要消化过剩产能，迫不得已政府才要求把原来的高速度降下来，因为不如此不仅结构无法调，而且产能过剩还会雪上加霜。当前的困难，是过剩产能尚未消化，而经济却又面临下行压力。屋漏偏遭连夜雨，政府要怎样做才对呢？

目前学界主流的观点，是扩内需，其实这也是凯恩斯当年的主张。是的，产能过剩而出口受阻，除了扩内需似乎别无他法。理论上，扩内需没错，而且也必要，但我认为这并非唯一上选，甚至不宜作为稳增长的重点。想深一层，扩内需无非是两招：扩消费与扩投资。消费决定于收入，扩消费就得涨工资。问题是企业有成本约束，工资不可能大涨；即便政府肯出钱也只能给公务员涨，企业工资大涨不了。由此看，靠扩消费稳增长怕是远水难解近渴。

政府扩投资呢？政府投资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政府就是投资基础设施；2009年应对美国金融危机，政府也是投资基础设施。事实上，在特定发展阶段基础设施投资是有适度规模的，并非多多益善，过多投资虽可锦上添花，但同时也会挤出企业投资。最简单的道理，财政的钱主要来自税收，政府花钱多了企业税负会加重，而税负重了企业投资会减少。

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这种替代关系，经济学早已讲得明白，所谓“财政挤出效应”、“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的就是这回事。令人不解的是，不知何故学界却一直未予重视。我想这大概是人们只相信眼见为实的缘故吧。比如政府扩投资能创造就业是可看见的事实，官方也有数据发布；而政府扩投资挤出多少企业投资从而减少多少就业，这事实却看不见。可看不见的事实也是事实，设想一下，若政府少投资而多减税，让企业少缴税多投资是否也能创造同样的就业呢？

是的，稳增长其实还有一个思路：推进与改善供给。面对产能过剩，除了扩内需也可从供给方面下力。绝非异想天开，经济学有凯恩斯学派，同时也有供给学派。上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走出萧条用的是凯恩斯学说；但70年代美国摆脱滞胀用的则是供给学派理论。供给学派能在美国成功，说明它有可取之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下行压力当前我们何不用来试试？

事实上，凯恩斯学派与供给学派也非全然对立，目标都是扩大就业。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以政府投资为重点；后者则主张以鼓励企业投资为重点。体现在政策层面，前者是发国债，后者是减税。读者应该记得，国务院当初推出积极财政政策时很多人不解，问财政政策只分扩张与紧缩两种，何来积极财政政策？现在清楚了，积极财政政策是泛指刺激投资的政策。发国债（扩张）是积极财政政策；减税也是积极财政政策。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问，今天政府为稳增长强调积极财政政策不变，那么重点是发债还是减税？若问我的意见我选减税。国债当然还可继续发，但规模要控制。要知道，近年来国内产能过剩，出口受阻只是原因之一，关键在两点：一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中未起决定作用；二是产业政策推波助澜。第一点有目共睹。第二点有事实为证：“九五”时期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十五”时期出现过剩；而2009年产业政策要振兴的十大行业，到2013年则严重过剩。

最近有句话很流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句话由李克强总理首提。不知读者怎么想，我倒觉得这是一个信号，预示鼓励企业投资有可能成为今后稳增长的重点。若果如此，我举双手赞成。在我看来，鼓励企业投资可一箭三雕：一是消化现有库存；二是创造就业、税收；三是便于用市场机制调结构，因为相比政府投资，企业投资更尊重市场。

道理虽如此，可目前仍有一点我拿不准。困难在于，鼓励企业投资得多减税，当前财政吃紧，政府会不会担心财政减收而举棋不定？其实这担心大可不必。供给学派“拉弗曲线”我解释过多次，何况之前又有里根的“减税试验”，有此担心的朋友去找相关文献看看吧。

宏观观察

经济形势谨慎乐观　调控改革亟待落实

——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形势与改革解读

□ 陈德胜　李洪侠

2015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但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必须切实落实已经出台的调控政策，守住就业、效益和风险底线，加快配套改革步伐，促进经济加快迈向中高端新境界。

经济“趋稳”背后仍有隐忧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旧增长动力尚未完成转换，外部需求收缩、内部“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大有其必然性。但经济增速过低或下滑过快容易引发失业、金融和社会稳定风险。我国经济情况复杂，判断形势关键要区分主要矛盾。只有抓住了“大头”，才能看清发展的“势头”。

消费回升的基础不稳固。从需求看，消费是“大头”，占比达60%。近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小幅回升，但如果考虑到基数低、去年曾现小幅反弹后继续下滑等情况，则目前回升难说已成定局。从增加值看，作为消费主要内容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二季度分别增长6.1%和5.4%，虽然略高于一季度，但比去年各季度明显放缓，也低于GDP增速。中长期内，消费主要靠收入增长和新消费热点的带动，但这涉及要素结构调整、制度变革和科技创新，不是朝夕之功。

第三产业提速不必然带动经济提速。从产业看，第三产业的贡献超过第二产业，占比达49.5%。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比去年同期和一季度均高0.5个百分点。但类似情况2012年一季度也曾出现且持续近两年，结果GDP并未同步提速。而占比43.7%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6.1%，连续第7个季度回落。部分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的确发展较快，但在经济中占比十分有限，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在GDP中占比不到10%，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仅为11%，难以弥补传统产业下滑缺口。

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回落。从收入看，劳动者报酬占GDP一半左右，企业收入占1/4，生产税净额占比不足1/5。近似代表劳动者报酬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五个季度双双回落，二季度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3%和6.7%，较一季度分别低0.6个和0.3个百分点。财政收入6月当月虽然有所提高，但往年也呈现类似月度间波动规律，难言趋势性回升。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降幅连续收窄，但这只是部分企业，而且与上市公司情况并不完全吻合。

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支撑经济企稳，内生动力尚未形成。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4%，其中国有控股投资增长12.3%，而占比65.1%的民间投资增长11.4%，今年以来持续放缓，说明市场对投资仍然谨慎。融资角度，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中占七成，上半年投资资金来源增长6.3%，国家预算资金增长18.6%，国内贷款和外资分别下降4.8%和30.9%。这说明，占比5%的财政投资在发挥逆周期调控作用，而银行对市场化投资前景仍不看好。

下半年经济形势谨慎乐观

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新四化进程加快，“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将拓展增长新空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释放制度新动能。但这些战略性、全局性、系统性举措需要逐步推进，近期在增长速度上的反映有限。

近几年我国经济持续下行，财政、投资等调控基本没有停止。如果说今年上半年的政策下半年开始落实，那么去年也呈现类似规律，也就是去年下半年基数偏高。今年下半年经济提速需要更大力度的调控尤其是投资，目前看没有也不允许这样做，因为“强刺激”可能会积累新的矛盾。

货币政策下半年有望结束时滞期。但是，一方面，中外都有通胀时期货币政策效果好于紧缩时期的规律。另一方面，我国货币政策关键问题在于传导机制不畅，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地方政府等对利率不够敏感，货币政策难以通过利率渠道传导；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在经济下行和趋于紧缩期，政策难以通过信贷渠道传导；股票市场大幅涨跌和由此反映的证券市场不规范，政策难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传导；汇率形成机制使货币政策大打折扣。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受阻，政策加码的边际效应递减。

房地产市场在供求总量基本均衡、利率进入下行周期而居民投资渠道有限、调控政策放松背景下出现小幅反弹，中长期房地产难以承担也不应再赋予其过重的经济发展职责。

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政策原因

同时也要看到，中央近两年推出的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是经济下行压力大的主观政策性原因。

国家出台多项稳增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先后三次降息降准，专门针对“三农”、小微企业定向降准，累计增加近3万亿元左右的可贷资金，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下降0.75个百分点。财政政策方面，地方债置换2万亿元，已超过地方政府今年偿债1.86万亿元的需求，地方政府推荐了近2万亿元PPP项目。投资政策方面，上半年，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机场建设等项目投资就超过8000亿元。截至5月底，7类重大工程包累计完成投资3.1万亿元。此外，还有大量消费、出口、“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政策。

调控落实不到位的“时滞”影响政策效果。受行政审批程序复杂、地方政府抓经济积极性降低、利益受损方抵制等多种因素影响，上述各项调控政策执行相对较慢。新形势下，有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表现出能力不够、意愿不强、迟缓犹豫等现象。政策执行中的时滞效应，导致很多政策特别是投资类政策无法立竿见影。比如，有调查表明，在中央不断简政放权之际，基层企业真正反映负担减轻的却十分有限。再如一些地方批到了资金和项目，但迟迟不能开工，财政资金趴在账上，影响资金运行效率和经济增长。

改革进展慢的体制“漏出”影响政策传导。中央深改组14次会议已经审议50项具体领域改革举措，通过了其中的37项，但相关领域和地区改革进展有限，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在很多省份没有变化，金融领域部分改革仍在徘徊。体制机制不畅不仅导致政策漏出，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制约。比如商业银行顺周期特征明显，传统行业贷款质量下降，银行可贷资金受限，其他融资渠道不够健全，降息降准政策难以促进资金流向真正需要的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难缓解。再如PPP计划已经拿出来了，但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契约精神得不到尊重等原因，社会资本对PPP项目持观望态度，无法及时发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作用。

落实政策守底，加快改革步伐

由于我国经济总需求收缩、新供给不足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下半年，经济运行的关键，是抓好已出台政策的落实。未来几年，经济走出困境，要靠科技创新和转方式调结构。因此，要突出解决好经济运行和宏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落实调控政策，守住就业、效益和风险底线，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将制度红利变成创新动力和增长活力。

抓好调控政策落实。近两年，国家不断创新出台货币、财政、投资等稳增长政策。下一步落实政策的关键在于：一是财政政策关键是降低企业负担和成本，发挥财政杠杆作用，精细化设计调控政策，预先设定调控政策的时间、力度和效果检验标准，针对PPP的制度、法律、诚信环境等问题，加快堵住漏洞，确保参与各方平等协商、诚信守约、优势互补、各得其所。二是货币政策不宜再密集降息降准，要继续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资本市场的逆周期管理作用，关键要加快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使利率、信贷、资产价格、汇率成为货币政策有效传导中介，定期公开调控政策执行效果报告。三是持续稳步推进城镇化投资，补齐农村短板，持续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补齐社会发展短板，持续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投资，补齐总供给短板。四是动态跟踪监测经济形势和改革进程，做到每项调控政策和改革举措都有跟踪、督促、评估和问责，整体统计第三产业财务情况，分别监测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生产和效益，按季度分别公开经济形势和改革进展报告。

守住经济发展的风险底线。一是守住就业底线要把握好企业破产退出的节奏，平衡好就业和生产率提高的关系。煤炭、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严重，山西、内蒙等地煤矿60%~70%停产，大量工人面临失业，但如果全部集中下岗，工人家庭、地方经济、社会稳定都无法承受。东南沿海很多企业加快机器代人的升级进程，客观上加剧了失业。目前就业数据表现仍然良好，主要因为来自两个方面的就业压力仍然没有累积到临界点。政府要分批分类处理企业破产和人员就业问题，多措并举鼓励创业。二是保持企业效益要把控去产能节奏，加快新产能形成。既要通过政府投资、政策性金融、挖掘消费潜力和支持经济社会短板，适度放缓钢铁、水泥等去产能节奏。也要通过降税、补贴、贷款优惠、上市等支持产能升级和新兴企业发展。还要缩减政府定价种类和项目，改革资源、能源价格机制，缩小价格扭曲导致的产业链不同环节企业效益差异。三是防控金融风险要平衡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均衡发展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分类对待出现质量问题的贷款，传统行业还款无望的，早作损失准备，必要的启动法律程序；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通过贷款展期、资产证券化、兼并重组等多种手段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于有稳定还款来源的企业也可以通过资产转让和证券化等腾出信贷额度，通过与资本市场合作积极支持创新创业型企业发展。打破刚性兑付，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协调推进股票、债券、基金、保险、信托等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分散化解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风险。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核心是要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互补性作用。一是落实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通过培训学习转岗、引进市场人才、运用现代科技、决策流程优化等途径提高政府事中事后监管能力，维护市场秩序。二是理顺商品、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推进价格体制改革，最大限度缩小政府定价范围，让价格信号引领能源、资源、资金、商品等流动。三是加快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集中力量管好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少数关键国有企业，多数国有资本通过国资运营公司和国资投资公司形式，确保保值增值目标，而不纠结于控股与否，使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四是改革财税金融体制，细化透明财政预算，完善地方税体系，构建稳定合理的央地关系和政府企业关系框架。推进银行综合化经营改革，引导储蓄流向多元化，完善资本市场，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完善的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五是优化创业创新环境，降低各行业市场准入门槛，建设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激发创新积极性，完善政府、企业和居民诚信体系，营造失信者寸步难行、守信者一路畅通的市场经济环境。

经济时评

把握好研究产业结构的最佳时机

□ 赵晓军

如果将一国经济视为一种有机体，那么产业结构便是有机体的骨架，金融机构则是密布的血管和经脉，而宏观经济政策更可细致地比拟为骨骼生长素，货币政策可比拟为血液。一国经济是否强健，在于其产业结构，金融机构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相互配套，共同支撑经济体的长久发展。在以上三个要素中间，不可偏向一方，在进行某一政策性调整时，应充分估计其他要素的影响，以整体经济向上发展为根本目标，局部要素的暂时性抑制也未尝不可。本文就产业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配套使用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关于产业结构的讨论是经济学上经久不衰的话题，传统上产业结构应理解为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分布。这是宏观上粗略的对产业结构描述，国家统计局在一、二、三产业的大框架下，又细分了若干产业，对其产值进行统计，绘制了比较细致的产业结构分布图。事实上，这种分法还是没能完全刻画产业结构，统计学上的数值仅能够给出产值的分布，对于细致的各产业之间关系没有涉及，而这恰是产业结构的内在精华。本质上经济体中各产业间关系对经济学者来说是一个黑箱，我们要通过各种统计方法来探求这一黑箱的结构。部分学者在投入产出表的前提下，通过一般均衡的方法来探求这一结构，并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的方法来对政策进行评估，并对经济进行预测，就目前来说，这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还有学者从我国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非水平竞争结构出发，提出我国经济的垂直结构理论，也较好地解释了一些经济现象。

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是产业结构的本质，近年来我国经济学者不断探索，已经就这一问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对于产业结构的这些阶段性成果并未进行总结，形成一种共识。就上述提到一般均衡方法和垂直结构本质上关于产业结构的认识是相左的，一般均衡方法认为各产业处于平行位置，无非在产业链中的先后位置不同，而垂直结构理论直接指出产业链中的核心产业具有统领整个产业链作用，它不同于一般均衡方法。因此，产业结构的核心问题一直没能很好地回答。既然产业间的关系客观存在，可否存在一种通识的做法，使其研究结构获得公认，并能有效地给决策者提供支持，这是这一代经济学者的首要任务。产业结构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结构不明，各类经济政策无从下手，实施的经济政策也无法预知效果。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国经济发生了很多结构性变化，各产业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经济政策的提出应更加谨慎。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转型经济体中，产业结构变化较快，结构比较不稳定，因而会给施政者带来一定的困扰。然而，经济发展至今，我国经济体已初具稳定结构，产业结构已有一定的稳固基础，我们要加快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认识，要尽可能地了解经济政策的可能效果，以及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这一切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对产业结构的深入研究上。

经济的发展时常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宏观上看就是一、二、三产业产值逐渐向高端倾斜。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工业化后期提出的概念，近代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以高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为标志。如果将改革30年视为我国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变的过程，那么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一定会出现大批服务于现代工业的机构。这些服务业诸如电商、高端金融服务商、工业信息化服务商、物联网服务商都已在我国蓬勃发展，形成第三产业发展的高峰期。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服务业产值将大幅上升，带动我国工业迈向更新的高度。

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要注意的是经济增长中升级，而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对一、二产业不可偏废，尤其是第一产业，更是国计民生的基础。第二产业也需渐进式的升级改造，步子迈大了，容易破坏产业结构，产生经济整体损伤，更不能采用移植的方式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要注意原有产业结构的延续性。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路径依赖，不可采用统一模式。产业结构升级是要优化原有的产业结构，而非破旧立新，这一点在实践中要尤为注意。

此时，产业结构升级也将催生新兴产业，新兴产业与原有产业是高度紧密相联、采用最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不断挖掘原有产业结构的潜力。这些新兴产业广泛分布在一、二、三产业中，并以服务于工业的产业为主，形成新的产业结构。所以，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在一产业比例下降，二产业比例增缓，三产业比例高速发展的格局中形成的。当前我国的经济实践正在逐步向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方向转变，以信息技术为纽带的各类服务业已广泛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产业中。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趋缓，产业结构相对稳固，这是研究我国产业结构的最佳时机，而我们的决策机构实证的前提也一定要以了解当下的产业结构为前提，做到心中有数，才可大胆施政，进一步优化我国产业结构。